

诗
想
者

H I P O E M

■ 张立群 著

Xintaishi

De

Yanjiu

Yu Jinlu

心态史的
研究与进路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心态史的研究与进路

张立群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态史的研究与进路 / 张立群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598-0398-6

I. ①心… II. ①张… III. ①诗学—中国—文集
IV. ①I207.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3433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长沙县榔梨镇保家村 邮政编码: 410000)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50千字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2017年，中国新诗迎来百岁诞辰。无论是兴盛期的群星璀璨，还是边缘化中的“野草”疯长，诗歌都以其独特的价值而葆有奇异的生命力，诗学理论也伴随诗歌发展而发展。百年回首，诗歌发展现状以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诗歌创作和诗学构建都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南方诗歌传播中心“诗想者”品牌着力推出“学人文库”，拟为改良当下诗歌生态提供一种参照。

中国新诗萌生之后，从早期呈现“百花齐放”的样态，到20世纪70年代受到压抑而蓄积能量，80年代得到爆发，90年代转向注重语言技艺的自我关注，到21世纪初期则呈现为活跃的多种诗歌活动和网络诗歌现象。诗歌的发展将何去何从？这就要整体性地对百年新诗进行历史发展与现实处境的梳理，由问题意识出发把握当代诗歌所面临的难题与困境，同时注重哲学思想转型和美学流变对新诗的写作技艺、思想与风格变化的影响，并通过研究代表性诗人、诗作来透视个体写作的历史意识、精神观照和语言表达技艺发展路径，为中国诗歌更好地发展提供营养。诗学被要求保持对当下诗歌问题的敏感和思考，不仅要有能力为巩固诗歌地位而进行自我辩护，还要与社会、时代保持反思性关联，并拥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多样的理论向度。

“诗想者·学人文库”推出国内6位“70后”诗歌批评家的诗学论文集或专著，包括陈卫的《中国诗人诗想录》、刘波的《重绘诗歌的精神光谱》、熊辉的《隐形的力量——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文体地位的确立》、易彬的《记忆之书》、张立群的《心态史的研究与进路》和王士强的《消费时代的诗意与自由——新世纪诗歌勘察》。他们既注重从总体上对中国百年新诗发展问题和现象进行宏观观照，关注时代思潮演变和中西方文化对诗歌发展的影响，又着力于诗人的个案研究，并对单首的诗歌进行文本细读品鉴。更有意思的是，本辑6位青年学者对这三个层面的研究还大致提供了一种诗学研究的对比，可以给诗人、学者和普通读者提供良好的参考。当然，本辑著作不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还请诗人、学者和广大普通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我们愿共同期待更丰赡的中国诗歌、诗学景观。

南方诗歌传播中心

2017年2月

目 录

现当代诗人心态史研究的构想 / 1

白话诗诞生期胡适的心态意识与路向选择 / 13

穆木天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创作“转变”之再探 / 37

转变、介入与自我认同

——论 20 世纪 30 年代杨骚的诗歌创作 / 60

戴望舒的诗人心态及创作道路 / 78

旧体诗词创作与胡风的心态 / 104

文学史深处的精神暗河

——昌耀诗歌论析 / 113

北岛论

——从心灵史到文学史 / 136

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心态意识 / 157

晚期风格的自我认同

——论欧阳江河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诗 / 174

后 记 / 196

现当代诗人心态史研究的构想

百年新诗的发展为人们留下了丰富的课题。除了已被反复言说多次的语言和形式的问题，诗人心态及其历史发展也是见证百年新诗史的重要方面。作为诗人心灵与外部环境碰撞、交融的产物，“诗人心态”既制约了具体的诗歌创作、反映了不同诗人独特的艺术个性，也影响了诗人不同的命运、生活道路及历史评价。如此交互影响，不仅构成了一部复杂的诗人心态史，而且也为现当代诗人心态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个案。

一、“诗人心态”的解读与类型化的考察

如果说“创作心态是诗人从事创作活动时表现出的心理特征，也是联结创作心理过程和诗人个性特质的中介”^①，指向的是诗人在创作某一作品时的心理状态，那么所谓“诗人心态”就还包括作家在某一时期内的心理状态。作为融合诗人人生观、创作动机、审美理想等多种心理因素的产物，诗人心态无疑是主客观世界相互交融、作用之后的一种结果。这种结果不但决定了诗人心态是一种复杂性的构成，也决定了诗人心态与生俱来的个人

^① 吴思敬：《心理诗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291页。

性特征。

与其他类型的心理状态相比，诗人心态当然也具有集体性的特征，因此影响诗人心态的外部社会环境又显得尤为重要。毫无疑问，诗人心态同样无法摆脱思想传统和历史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就创作本身而言，凝聚在一部作品内的诗人心态往往只与诗人的艺术追求、情感和情绪的变化有关，诗人心态由此显示出其具体化、个性化的一面。与之相比，那种由不同诗人组成、表现出带有共同性倾向的诗人心态则需要外力作用或是其他途径得以实现。就百年新诗的发展历程来看，上述现象的出现主要与时代主潮、社会文化对诗歌的呼召和引导有关。此外，就是在特定时期有着共同艺术追求的诗人群体及诗歌流派成员的创作中得到体现。现当代诗人心态个体与群体兼具的特征，客观上决定其可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来加以概括。但无论是哪种概括，诗人心态都具有“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的复杂性”所包含的“多面性”“矛盾性”“变异性”^①等方面的特质：这些特质既是现当代诗人不断追求审美艺术的结果，也是其不断调整生存处境、适应时代语境的结果。这些特质立体交融、相互作用，共同建构起诗人的心态及其历史。它们时而稳定持久，时而缓慢渐变，取决于诗人内在的气质及其自然延展；时而突然、剧烈，与诗人受到的外部压力及程度有关。诗人心态正是在此前提下曲折、多元地反映了诗歌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二律背反关系。

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中，三位作者曾认为：

^① 关于“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的复杂性”及其包含的主要方面，本文主要参考了杨守森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的提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8—13页）。

“本世纪世界诗歌语言正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巨变。在这种情势下应运而生的中国新诗，不能不在一个古老的诗国中走着艰辛曲折的道路……诗体的解放、复活、创新等复杂的运动，最鲜明地凝练地集中地体现了本世纪中国文学在艺术思维上的挣扎、挫折、进展和远景。在各类文体中，新诗最敏感最密切地与当代世界文学保持着‘同步’的联系。”^① 如果从百年新诗自身的现代性追求和渴望与世界文学保持同步的角度来看，新诗在发展过程中首先需要一种追求审美理想的诗人心态，新诗史上每一次源于诗艺本身的争鸣也确然证明了这一点。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的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风起云涌、历次革命运动与文艺争鸣，都使新诗诗人常常要面对如何从功用的角度进行创作的问题。这一客观实际情况除了造成新诗诗人需要承担艺术的焦虑，还需承担、释放来自时代、政治、文化以及生存方面的焦虑，而诗人在自己的创作史中，常常于特定的历史阶段表现出前后矛盾、充满焦虑以及个人命运的曲折坎坷、歧路彷徨。

以各种“焦虑”为线索看待现当代诗人的创作，现当代诗人的心态往往是几种焦虑的集合体。源于诗人心灵的艺术焦虑、生存焦虑以及外部的时代、社会、文化的焦虑可以以对立统一的方式，共时性存在于某一情境的诗人心态之中，进而创作出情态各异的作品。当然，就阐释的层面而言，诗人心态主要只能以类型化的方式加以言说。鉴于此，本文将现当代诗人心态分为如下四个主要类型。其一，以追求诗歌艺术为目的的艺术型心态。这种诗人心态总体表现为坚守诗歌的艺术本位，有明显的固守象牙塔

^①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5期。

的倾向。20 世纪 20 年代的“新月派”实践、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派”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这种心态。这些诗人也因此推动新诗艺术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但其问题是与社会现实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因此不得不面对来自诗歌外部的压力，并不得不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改弦更张，从远离现实到回归现实。其二，带有鲜明功用意识的实用型心态。这种诗人心态在百年新诗历史中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主流，并与所处时代紧密相连。从胡适最早实践白话诗，到 20 世纪 20 年代的普罗诗歌、20 世纪 30 年代“左联”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创作，再到抗战时代的朗诵诗、诗歌大众化，20 世纪 40 年代国统区的“七月派”诗歌、讽刺诗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放声歌唱”“政治抒情诗”“大跃进”时代的诗歌等。实用型心态不仅紧跟社会现实的发展，带有显著的实用功利性色彩和政治文化意识，而且还影响着百年新诗的发展与面貌。不同历史时期，都有这种诗人由于过多地受到社会现实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强烈的现实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他们或以自发的形式主动搏击时代主潮，或自觉接受社会现实塑造了的、带有共同倾向的诗歌创作及思维方式，并最终汇成一波波诗歌浪潮。在此过程中，诗人从未放弃自己的艺术探索，但其前提或曰实践的可能是与社会主旋律保持一致，而其以实用性、功用性为主的特征呈现出社会伦理意识并在很多场景下成为“写实”“现实”的代名词。其三，文化型心态。主要指通过诗歌创作，书写历史，展现传统文化及对历史、文化的思考。现当代诗人通过现代汉语在不同时期进行的此类倾向的创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着这种心态，而其具体外化的结果则是诞生如杨炼、江河创作的系

列文化组诗及神话史诗。其四，个体生命和情感体验的心态。这种心态可包括现当代诗歌中的爱情诗创作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的个人化写作，是一种普遍而又具体的诗人心态。对于晚近的诗歌创作，它主要呈现了诗歌的社会现实对话能力减弱、公共话语空间减缩的一种趋势。至于数量巨大、新作频出的网络诗歌是否可以归入这种心态类型，还需做艺术的、历史的考察。

二、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式

“现当代诗人心态史研究”课题的确立，客观上决定了其研究思路与研究方式。鉴于“诗人心态”是此选题的核心关键词，“现当代”和“心态史”决定了本课题的研究视域和具体书写过程中的时间跨度。所以，“现当代诗人心态史研究”在具体展开时首先是以现当代诗人为主要对象的一次书写。除了必要的理论阐释，“现当代诗人心态史研究”主要应以历史发展及诗人心态的发展和变化为基本线索，既凸显时代、社会、环境对现当代诗人心态的影响，又充分关注现当代诗人的生平、艺术追求及其作为诗人心态的主观能动意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只有那些可考有明确创作思想、曲折心路历程，或是生活经历坎坷、创作道路发生显著变化的“诗人”，才体现出丰富、芜杂、多变的心态可供阐释。而对于那些无法独立成篇的诗人心态，则需要在书写的过程中处理好主次关系、详略得当。为此，在总体上以个体诗人及其心态为主干的同时，“现当代诗人心态史研究”还可以通过年代、区域及潮流、现象、流派的概述方式进行合理的阐述与补充，进而在实现总体结构的过程

中多角度、多层次地呈现现当代诗人心态的历史图景。

以 20 世纪 20 年代的诗歌发展为例，郭沫若、李金发、徐志摩、闻一多、朱湘、蒋光慈都堪称那个时代的著名诗人，有大量的作品、文论可以考察其诗人心态。但对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当如何阐释呢？在我看来，通过群体或是社团流派的角度，阐述创造社后期诗人、太阳社诗歌、新月派诗歌是一种可行的策略。另外的一些诗人，则可以通过某些潮流和现象将其诗人心态汇聚一起做阶段式的共同阐释。如以“五卅运动”时期的诗歌创作为切入点，我们通过其在 20 世纪 20 年代文学史上的转折意义来谈论其对诗歌创作产生的意义。“五卅运动”历时两年之久，大致可以从 1924 年年底“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开始，经历 1925 年初上海的二月罢工、5 月的“五卅惨案”，直至 1926 年北伐战争开始、省港大罢工结束，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一次伟大的、群众性的爱国反帝运动。它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在全国范围内为北伐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并将国民革命推向高潮，从而揭开了 1925 至 1927 年中国大革命的序幕。由“五卅运动”引起的创作高潮、道路转变及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也在许多亲历者那里得到充分的阐释。比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的导言中，郑振铎就曾指出：“五卅运动在上海的爆发，把整个中国历史涂上了另一种颜色，文学运动也便转变了另一个方面。”^①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导言中，茅盾曾说：“到‘五卅’的前夜为止，苦闷彷徨的空气支配了整个文坛，即使外形上有冷观苦笑与要求

^① 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导言》，载郑振铎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影印本，第 16 页。

享乐和麻醉的分别，但内心是同一苦闷彷徨。”^①王哲甫在其所著的我国最早的一部现代文学史《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也是以1925年“五卅”为界，将1917—1933年十七年的新文学创作分为一二期^②。“五卅运动”时期在20年代文学发展道路上的界碑地位，自然可以将当时许多诗人的创作通过“心态”的方式联结起来。比如，“五卅惨案”爆发后不久，身在上海的郑振铎便写下了《为中国》《墙角的创痕》《我们的中国》；而身在浙江的朱自清在听闻消息后，也迅速写出了《血歌——为五卅惨剧作》《给死者》；因工作原因身在北方的蒋光慈，闻知消息后，迅速写出《血花的爆裂》《我要回到上海去》，后又创作长诗《在黑夜——致刘华同志之灵》《血祭》^③等；有感于归国后的见闻特别是“五卅运动”的激发，在1925年七八月间，闻一多相继于《现代评论》《大江季刊》等刊物上发表了《我是中国人》《长城下之哀歌》《爱国的心》《一句话》《发现》《洗衣曲》《回来了》《故乡》等大量的爱国题材的诗；此外，还有柯仲平的《伟大是“能死”》，殷夫的《血字》《上海礼赞》等。如果将这些创作与朱自清在1927年写的《新诗》一文中的回顾中所说的“在‘四面楚歌’中，新诗的中衰之势，一天天地显明……若许我猜一猜

①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载茅盾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影印本，第12页。

②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第70—71页。

③ 上述几首诗的创作实践依次为“1925年6月2日”“1925年9月12日于北京旅次”“1925年12月21日”“‘五卅’流血周年纪念日”。（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第408—426页。）

新诗坛冷落的因果，我将大胆地说：生活的空虚是重要的原因”^①，我们显然可以发现这些作品拥有反抗斗争、团结反帝的爱国主题和强烈、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读解出时代语境对诗歌创作和诗人心态的影响，他们直面现实、直抒胸臆，既饱含激情又有写实之风，也就变得不难理解了。

出于具体行文的考量，“现当代诗人心态史研究”不应当在阐释每个时代代表诗人心态的同时，使其与具体的潮流、现象、流派等并列在一起。为此，对于每个时代代表诗人心态的阐释，使用“年代史的视野”与代表诗人心态个案相结合的方式，这不失为行之有效的策略。所谓“年代史的视野”，首先是对这一时代“诗人心态”进行整体的概括性叙述，涵盖那些不设专题论述的重要诗人之心态，并以潮流、现象、流派、主题等为具体对象，形成“某一年代诗人心态综论”；然后，突出这个年代的代表性诗人的心态；对于贯穿不同时代的诗人在论析其心态时有主有次，次要部分放于“某一年代诗人心态综论”。以“年代史的视野”和“诗人心态”相结合的形式，构建“现当代诗人心态史”的基本框架与发展线索，还可以全面呈现现当代诗歌各阶段历史的连续性与语境的转换，弥补许多诗人因“跨年代写作”而造成的叙述分散和结构的不平衡，并最终实现现当代诗人心态史与现当代诗歌艺术史的有机结合。

^① 朱自清：《新诗》（1927作），载《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第210—214页。

三、研究方法的立体多元展开

与“现当代诗人心态史研究”研究思路与方式相一致的，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及其立体展开。与任何一种文学史研究一样，“现当代诗人心态史研究”首先要强调材料的重要性，因为这是现当代诗人心态研究的基础。就具体材料而言，“现当代诗人心态史研究”所选用的材料有原始期刊、诗人的全集或文集、诗人研究资料汇编、诗人传记等。鉴于“现当代诗人心态史研究”要结合大量材料才能正确推究诗人的心态，在强调拥有这些基本材料之外，还需指出其具体应用。以诗人传记为例，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专家马良春早于 1985 年就著文，将其列为现代文学史料之“第五类：传记性史料”^①。传记史料虽表面看似简单，其实包罗万象。仅就传记本身而言，就有“自传”和“他传”两个基本范畴。而就形式来说，“自传”又可包括诗人日记、回忆录、口述史等亚形态；“他传”则有传、评传、外传、小传、图传、画传、故事等，由他人所著年谱也可算作“他传”范畴。现当代诗人尤其是现代就已成名的诗人，其生平、创作成绩等一般已获稳定的评价，因此许多诗人都有他者所著传记且不止一种，像胡适、郭沫若更是生前就写有自传。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传记文学的蓬勃发展，许多属于特殊形式的传记也陆续出版，比如，江苏文艺出版社从 1996 年开始陆续出版的“名人自传丛书”就包括徐

^① 马良春：《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科学”的建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 年 1 期。在文中，马良春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分为七类，其“第五类”为“传记性史料”，具体包括作家传记、日记、书信等。

志摩、朱自清、胡风、冰心等由后人依据诗人各种相关文字编辑而成的自传，这样的自传版本当然具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各种诗人“自传”和“他传”中的优秀作品对研究诗人心态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不了解一个诗人的成长史和性格、气质，确实很难对其诗歌创作和诗歌道路的选择做出准确的判断。诗人许多场景下丰富的内心世界在作品中是无法获取的，通过传记提供的信息与作品互证就成为一条重要的途径。在传记使用过程中，各种形态的“自传”（包括日记、回忆录、口述史等）不管掩饰了诗人怎样的内心世界和生活经历，都不影响我们将其视为和作品全集同等地位的材料并加以使用。但由他人所作的“传记”（年谱除外）则要鉴别使用，这是因为现当代诗人传记版本过多、良莠不齐，而近年来传记写作受消费时代大众阅读期待的影响在出版过程中有传记质量降低的倾向（如现代的徐志摩、林徽因，当代的顾城、海子的传记）。这也是在上文叙述过程中强调“他传”中优秀作品的重要原因。

在明确“现当代诗人心态史研究”的基础之后，针对具体研究对象，可使用的方法大致包括如下几方面：首先，是文献整理与史科学的合理应用。针对现当代诗人的全集、传记、资料汇编等材料，文献的搜集、整理、分类与使用是第一阶段，可以使课题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史料基础之上。在文献整理与史科学合理应用的过程中，平行比较与版本互见是需要提及的一环。现当代诗人在其生活和创作道路上一直有些“悬案”，或说今天许多人难以说清楚的问题。诗人在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作为社会一员，会因种种原因产生误会、矛盾甚至就此因为诗人性格终生结怨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些很难说清的问题应当如何呈现于诗人的心态

史中？恐怕仅通过诗人本身的言论很难全面、客观地呈现问题。此时，通过文献整理不同相关人士的记录，综合分析问题是一种较为可行的实践。当然，这样的设想会在客观上决定现当代诗人心态的具体分析要搜集大量的资料，并需要在文中加以解释、说明。其次，是心理学分析和阐释学、新批评方法的有机结合。“现当代诗人心态”需要使用心理学分析的方法，察觉文字组合显露出来的心理症候。结合现当代诗歌的具体实际和心理学分析之现状，主要使用文学心理学并适度吸纳语言心理学。与之相应的，阐释学和新批评的方法主要针对具体作品的解读，指向具体的文字。显然，为了解读诗人的心态，阐释者需要有深入、细致地解析作品主题、意象、方法、修辞等方面的能力，同时“细读法”以及张力、反讽、悖论等分析方法的引入会使其得到更为有效的阐释。最后，是历史学、社会学等方法的综合使用。现当代诗人心态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语境，这使得“现当代诗人心态史研究”的研究主体必须对诗人心态所处的时代、社会、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并能揭示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上述几种研究方法相互结合、立体展开，既可以阐释现当代诗人个体的心态，又可以分析诗人与外部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避免简单的材料堆积特别是“传记式的重复书写”，并最终使现当代诗人心态从心灵史的书写成为文学史的书写。

总之，回首百年历史，现当代诗歌坎坷的历程使新诗诗人常常陷入一种矛盾的状态之中，而其心态也随之变动，令人在追溯的过程中回味与深思。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新诗由于社会与文化、传播与接受等外部原因，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而此时的诗人心态也由于进入个体狭窄的空间而表现得不十分明显。